



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

◆ 徐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 温丽萍

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圣王,关于其事迹传说分布的地域极广,司马迁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即早在两千多年前,舜的事迹即已广泛散布于北起燕山、南到江淮,东至大海,西达甘陕的广大地区。

关于舜的出生地,目前存在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湖南等多种观点,但结合文献综合考察,以“冀州说”与“东夷说”最为普遍,而“东夷说”更符合事实。

舜为东夷人的说法,见于《孟子·离娄下》: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明确称舜为“东夷之人”。

关于“东夷”有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东夷即指东方夷人,系指今山东地区或者江浙地区的夷人,一种观点则认为东夷,是指在帝都以东的少数民族,处于周都以东的晋南也可称东夷。我们认为,东夷应该是指山东地区的东夷,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离娄下》言:

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

清人焦循言:

赵氏盖略闻诸冯之负海而未得其实,故浑而言之。

《孟子正义·离娄下》

即舜出生地诸冯当离大海很近。《孟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蹠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尽心上》

称舜“遵海滨而处”,那么舜所居之地应当离海不会太远。

舜为东夷人的记载,除《离娄》以外,还见于其他文献:

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韩非子·难一》

另外后汉冯衍《显志赋》有:

皋陶钓于雷泽兮,赖虞舜而后亲。

《论语·颜渊》也说: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

《帝王世纪》曰:

皋陶,曲阜之偃人。

与舜有密切关系的皋陶是东夷人,也可以作为舜为“东夷之人”的一个旁证。

在《孟子·离娄下》这段话中,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是与“中国”相对而言的。所以,确定“中国”所指的范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东夷的地域。古代“中国”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国都,例如《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毛茌注曰:“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曰:“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解》说:“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把都城称作中国。另一个含义指中原地区,春秋以降,中国主要是这个含义,用作京都的例子较少,尤其是《孟子·离娄下》称舜、文王居地相差千余里,“得志行乎中国”,是指舜、文王行其志于天下,

这里的中国显然不只是指国都而言,而是指整个中原地区而言。

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即被用来指称中原地区。

商人已经产生了自己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在卜辞中自称所居之地为大邑商或中商:

丁卯,贞今占巫九备,余其比多田多伯征孟方伯炎。隹衣翌日步……左自上下于𠄎示,余受有佑,不𠄎𠄎……于兹大邑商,无𠄎在𠄎。在十月遘大丁翌。 《合集》36511

甲午王卜,贞作余酒,朕求酒,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𠄎示受有佑,不𠄎𠄎祸,告于大邑商……在𠄎。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𠄎。隹十祀

《合集》34682

又称中商:

……勿于中商。 《合集》7837

口巳卜,王,贞于中商乎御方。 《合集》20453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口月。 《合集》20650

商人还把商与四方连言:

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 《屯南》1126

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合集》36975

南方

西方

北方

东方

商 《屯南》1126

中商及其把商与四方相对的说法表明,商人自以居于四方的中心,以商为天下中心的观念已经昭然。胡厚宣先生认为殷商时代“中国”称谓已经起源。

尤为明显的是,周人称商人所居地区为中国,而称自己居住的地区为西土,完全以商人的视角定义当时的天下区划。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曰: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惟玟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𠄎(义)民……惟王五祀。

以中国指商人居地。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文王曰:咨女殷商,女𠄎然于中国,𠄎怨以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蠋,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𠄎于中国,𠄎及鬼方。

《诗经·大雅·荡》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尚书·周书·梓材》

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尚书·诏诰》

以上之中国一指殷商居地,一指洛邑,皆是商人王畿区内。即在西周初年,周人所说的指中国皆指商人居地,而自指时则曰“西土”:

逖矣,西土之人……弗迓克奔,以役于西土。

《尚书·牧誓》

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尚书·康诰》

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𠄎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尚书·酒诰》

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尚书·康诰》

有大𠄎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𠄎。殷小𠄎诞敢纪其𠄎。

《尚书·大诰》

周人以“西土”自居,只有提到商人的土地与人民时才用中国称呼。

商人的中心地区,“其东界大体在河南柘城、商丘以西和濮阳迄东一线,南界在淮阳、鲁山一线,西界在孟津和太行山以东”。即商代的“中国”,主要区域在豫北,其东界至河南、山东交界处,西界到太行山一线。

当周代商立后,以中央王朝自居,占据了原商人疆域的同时也继承了“中国”的称呼。但周代“中国”的范围也基本以中原为限,这在文献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莅中国而抚四夷也。 《孟子·梁惠王上》

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

《孟子·滕文公上》

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孟子·滕文公上》

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庄子·田子方》

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 《礼记·王制》

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 《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

《公羊传·禧公四年》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史记·楚世家》

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整个周代直到春秋时期,“中国”所指的是中原地区。尤其是《孟子》一书的“中国”,也主要是指中原地区。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东夷”,显然只能在中原地区的东方,其中山东地区是最符合的地区。

因此,舜生于晋南的“冀州说”基本可以否定,而“东夷说”则非常可信。

尧、舜时代中国处于国家形成时期,是国家起源过程中一特殊的阶段,尚没有明确的疆域界化,国家权力也尚未严格遵循世袭制,部族流动是很平常的事情。舜很可能是生于山东地区,后迁徙到晋南地区,并最终被尧选拔为最高首领。关于舜的西迁,文献中有记载:

舜有膺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

《庄子·徐无鬼》

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

《管子·治国》

这些与《孟子·离娄下》所载的“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可以对应。另外,《战国楚竹书·子羔》有:

……或以摅而远,尧之取舜也,与之言礼,悦口……

王晖先生释“摅而远”说:“‘摅’本作上‘鹿’中‘且’下‘又’的三合之形,可隶定‘摅’,而读作‘阻’……都是指道路艰险难行而且路途遥远。”即舜本来的居地与尧所在都城之间“阻而远”,尧都在晋南地区,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即尧都平阳。而陶寺文化也的确包含多种文化因素,“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性性

质”,其中东方和东南方的文化因素最为显著,有东方部族迁徙至此,是很可能的事情。那么与尧都“阻而远”的舜显然不可能是原居于晋南地区,而很可能自东方迁徙而来。因为舜在晋南地区成就了事业,后人也把他视作晋南人,所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冀州之人也。”

舜为“东夷之人”或“冀州之人”只是侧重点上的不同,一记其出生之地,一记其成功之地,两者并不矛盾。

山东诸城地区处于龙山文化发达地区,又有文献和传说相照应,在地理上也符合舜居“负海”之地的条件^⑩,舜生于诸城是极为可能的。另外,山东菏泽地区也有很多关于舜的传说和记载,只是因为考古和研究工作尚待加强等原因,尚未引起学界充分的关注。相信随着考古工作和研究的进行,舜与舜文化的地域分布和历史流变会越来越清楚。

注释:

《史记·五帝本纪》。

a.孙玮、闫茂新:《古帝王尧、舜、禹东夷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b.王晖:《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张培莲:《舜帝祖籍考证》,《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胡厚宣:《论殷代五方观念及“中国”称谓之起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

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王晖:《舜族早期居地及三迁考》,《虞舜文化研究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

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华夏文明》(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10 高炜:《龙山时代中原玉器上看到的二种文化现象》,《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

⑪ 焦循:《孟子正义》又引赵佑《温故录》云:“今青州府有诸城县,大海环其北。”

(特约责编:徐义华)



本期导读

近几年来,关于五帝时代的研究形成一个热潮,促进了对中国早期历史认识和思考。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时代久远文献资料较少,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的结合还有欠缺,文献和民间传说与古迹掺杂在一起,研究者的出发点和目的也各不相同,最终造成各说各话互相攻诘的局面。

本期所选的论文,从舜的出生地与其史迹分析出发,对舜及舜文化进行了探讨。

一、《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

王震中先生《大舜文化与中华早期文明》一文,虽然也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考订舜的生地与生活地,但更注重理论的探讨。

综观整个中国上古史,作者提出“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之类的“某某氏”的方式,是因古人的思维特点是借助于具体来表现一般,是古人对上古历史文化发展的一种时代特征的概括。但尧、舜、禹时代及其谱系,则是具有相当的可信性。

尧、舜、禹时代已经是国家形成时期,具有相当的可信性。自文献记载看,尧、舜、禹时代是紧接夏朝的时代,而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王朝,已经进入国家时代。国家是与一定的地域和人口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有较为稳固的地域和人口构成,所以以夏代史为基础,上推可以对尧舜禹时代有所推论。因此王先生将尧、舜、禹时代单独考察,是值得信从的。

作者认为从文献中的相关记载看,舜生于诸城。诸城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诸城前寨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陶文“火正”字,表达了当时的“火正”(主管大火星祭祀及观象授时的职官)对于大火星的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表明宗教祭祀逐渐被上层贵族和专职巫觋所独占。这一符号广泛出现在山东、安徽、湖北、江浙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陶器上以及江浙良渚文化中,具有高度的传播特征,说明诸城在早期文明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诸城在龙山文化时已进入文明时代。

舜文化的分布不仅仅局限于山东地区,还发展到了中原和南方地区。究其原因,尧舜禹时期处于“万邦”、“万国”时代,万字只是言其多,而非实指,表示了小国林立的一种状态。尧舜禹时期的“族邦”就是初始国家或者说是早期国家,尧舜禹诸族之间的结盟也就属于邦国结盟,尧、舜、禹都是本邦的邦君,也都曾担任过邦国结盟的“盟主”,所以后人也就承认其为“天下之王”。夏商周三代王朝之王的“天下共主”地位系由尧舜禹时期邦国“盟主”转化而来。

成功解读尧、舜、禹时代,还有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即如何解决国家形成初期的权力组织和运作方式,西方或者东夷部族的人何以最终成为中原乃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首领,必须做出合理可信的解释。王震中先生在讨论舜与舜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同时,也从理论上解释了舜的迁徙成长与早期国家组织形式的问题,为解决早期国家文明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路。

二、《柔远能迓——舜团结、巩固部落联盟的策略》

杨升南先生《柔远能迓——舜团结、巩固部落联盟的策略》认为舜所处的时代为部落联盟时代,尧初举舜时,还存在着“四凶”、驩兜、共工、鲧等反抗舜的势力,破坏着部落联盟的巩固。为了巩固部落联盟,舜采取了团结联盟内的部族落、争取联盟外的部族扩大联盟的两方面的策略,具体可以概括为“柔远能迓”,“能迓”即任用、提拔部落联盟内有才能而有德的人,“柔远”吸收联盟外的部族加入部落联盟。舜的措施壮大了部落联盟,在此基础上分职任官,区划地域,形成了具有国家雏形的领土部落联盟,奠定了我国统一国家的基础。

尧舜禹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处于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许多史书是将虞、夏、商、周四代共举,将虞作为一个正式的朝代,这种认识并非偶然的。对尧、舜、禹时期的相关情况朝廷探讨,对于认识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舜时期政治体系的巩固与扩大,肯定在国家形成初期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限于篇幅的关系,有一些论述没能展开。例如从尧到舜,权能分配出现的变化,本身可能并非单纯首领策略与用人方式的变化,而是随着体制的成熟,权能本身产生固化的倾向。另外,当时的政治体制能否用后世单一的权力体系加以类比和考察,还是值得考虑和加以解释的。

三、《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

徐义华《从“中国”看舜的出生地》认为在关于舜出生地的多种说法中,以冀州说和东夷说最为可信,所以辨清冀州说与东夷说的分歧是关键的一步。

《孟子·离娄下》记载舜为东夷之人,东夷是与中国相对而言的,所以确定了中国的所指的地区就可以确定东夷所处的大体方位。从夏、商、周三代的记载看,三代时期所称的“中国”都是指今天的中原地区而言,尤其是《孟子》及其同时期的文献中,“中国”主要是指中原地区。那么相对中原而言的东夷,应该在今中原以东地区,以山东地区可能性最大。作为“东夷之人”的

舜,出生地当在山东地区。

尧、舜时代中国处于国家形成时期,是国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阶段,尚没有明确的疆域界化,国家权力也尚未严格遵循世袭制度,舜很可能是生于山东地区,后迁徙到晋南地区,并最终被尧选拔为最高首领。

山东诸城、菏泽等地都有丰富的关于舜的传说,是舜出生地的可能性很大。

五帝时代古史资料与传说的分布是有一定规律的,即古代人物及其史迹的分布呈现出区域性,形成一个个文化圈,对古史与传说进行区域综合研究,应该是有潜力的方向。就舜的记载与传说分布而言,北到河北,南到广西,西到陕西,东到大海的广大地区都有分布,但集中分布的区域则有四个,一是山西地区,二是山东地区,三是湖南地区,四是浙江地区。从古代的气候地理、产业结构以及后来的历史演变看,湖南和浙江属多水地带和稻作文化区,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较晚,直到周代依然与中原文化差异很大。而整个中国远古历史当中,华夏和东夷几乎是当时的主流问题,所以属于中原文化范围的山西舜文化区和属于东夷文化的山东舜文化区就值得重点考察。我们认为山西舜文化与山东舜文化区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推而广之,所有舜文化圈都可以综合进同一课题考察。舜文化圈的研究,对于认识古代夷夏关系,认识古代国家形成、民族融合和社会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舜为“东夷人”考》

朱玲玲《舜为“东夷人”考》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诸冯的冯字是轻读语尾音字,在文字记录时是可省去的,不省作“诸冯”,省则作“诸”,诸冯即诸。从相关文献看,诸冯、诸、诸城三名一地,其名称具有清楚的演绎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虽称舜为“冀州之人”,但同时所提及的其他地名中有些还是属于“东夷”地区的范围,而山东地区也有济南和菏泽两处历山,与文献中的地名相合。

作者认为孟子记载早于司马迁,孟子又是东夷之人,对于当地的历史比较了解,其记载更加可信。而山东地区高度发达的陶器,也可以与《韩非子·难一》记载“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的记载相联系,从考古方面提供一个旁证。

研究五帝时代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名的研究。关于古人生地问题,学者常沿用地名讨论的方法进行研究,利用地名确定古人的活动范围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汉语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发音很少,通观今、古文字典,也不过几百个音节,语音变化不多,而同音现象严重;二是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尤其是古代,多用字而非词叙述,这也造成同音现象增加;三是汉语记录方式,古代文字在记录时常用假借等方式,导致古代一字多用或多事用一字的情况。所以古代地名相重的情况就会很多。以舜文化研究为例,就目前的研究看,无论在某一地区,几乎都能找到同名的地方,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名链条。所以单纯的地名考证,已经很难确定上古时期的地域。利用地名研究上古史,还需要更多的其他资料共同论证。

五、《上虞、余姚舜迹考》

李岩《上虞、余姚舜迹考》一文探讨了江浙地区的舜文化分布情况与其产生的原因。江浙地区也是舜文化集中地域之一,以浙江上虞、余姚为中心,北至绍兴、嵊州、萧山,西涉永康一带,有大量以舜命名或是与舜的事迹相关的地名和文化纪念物,在一些地区还存在着世代用口耳相传的有关舜的传说故事,形成了一个虞舜传说文化圈。同时,还有民间自发的祭祀舜的行为,这种现象在全国是少见的。这一地区舜文化也有文献资料的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诸因素完整的舜文化分布区域。

从广义的东夷而言,江浙地区也属于东夷范围之内。江浙地区不仅有舜的传说,而且继承舜地位的禹在这一地区也有很丰富的史迹与传说留存,所以,江浙地区是五帝时代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的地区。

关于五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如此广大地域内分布着五帝的记载与传说,很难作为直接做单纯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所以,分散的具体的个案研究要取得重大进展是很困难的。五帝文化已经不单纯是历史史实,而是一种文化现象,五帝也非具体的人物与活动,而是形成一些分布密集的文化圈。如果先从文化现象和文化圈两个方面加以研究,结合考古资料加以更具体的审核,加以国家与文明形成的理论探索,或者对于最终廓清五帝时代的历史有所帮助。

因此,综合考察各个舜文化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对研究是有益的。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对三皇五帝时代,基本定义为传说时期,而不将其纳入历史时期的研究。但随着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的进展,越来越多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五帝时代,并提出其社会发展阶段和与之相对应的考古文化。虽然是初步的,但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同时,目前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五帝时代的资料条件和积累成果尚少,研究条件依然不成熟,还是应该坚守疑古派的成果,对这一时代持阙疑的态度。作为学术研究而言,尤其是恢复完整的中国古史而言,五帝时代是不可回避的课题。目前学界关于这一时代的研究不是过多,而是关注过少,专业学者对此一课题的拘泥,与非专业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热心,形成一种反差。专业学者积极涉足于这一领域,无论于促进学术进步还是正本清源都十分必要。

退一步讲,五帝时代即使不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单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是颇值得关注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言:“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这种普遍性的认同,并非官方宣传的结果,而是民间自然的认识,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广大地域内的三皇五帝文化认同圈。这个文化认同圈是如何形成的,有怎样的背后动因和社会运行机制,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王宇信)